



探古求原

——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

考古杂志社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在成立十周年之际组织编著的纪念学术文集。文集共收录17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史前文化、青铜文化、铁器时代文化、殷代甲骨文、古代玉器、秦始皇陵、秦汉长城、古代壁画墓、古代剪刀、汉代铜镜制造业、古代木枕、汉代墓葬、新罗都城、明代墓志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动向,并提出了诸多新观点与新认识。

本书可供研究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的学者以及相关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考古杂志社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3-019681-1

I. 探… II. 杂…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8120号

特约编辑:顾智界 冯浩璋 / 责任编辑:宋小军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陈 静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8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3/4 插页1

印数:1—1 500 字数:500 000

定价:1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目 录

时光常存(代前言).....	白云翔 施劲松(1)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	王 巍(17)
河北任丘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存再认识	彭菊如 高天麟(32)
吴城遗址与商代江南	施劲松(46)
殷代占卜书契制度研究	冯 时(66)
早期铁器时代内蒙古长城地带与相邻地区的文化联系.....	乌恩岳斯图(103)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玉器简述.....	曹 楠(125)
秦始皇陵考古述评.....	刘庆柱(133)
考古学上所见的秦汉长城遗迹.....	徐莘芳(162)
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综述.....	杨 泓(172)
中国古代的剪刀.....	杨 毅(192)
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	白云翔(207)
略论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木枕.....	洪 石(244)
论汉代墓葬的文化特点.....	谭长生(258)
承前启后的东汉魏晋南北朝玉器.....	卢兆荫(279)
新罗的历史·文化及都城的形制.....	王仲殊(291)
论同仁一期文化与奈费尔德类型的关系——兼谈陶斜口器的功能与名称.....	林秀贞(302)
明路晔及路升墓志考略.....	徐元邦(320)
考古杂志社(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大事记.....	(331)
编后记.....	(338)

CONTENTS

- Time Lasts for Ever; Prefatory Remarks *by* Bai Yunxiang and Shi Jingsong(1)
- New Trends and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by* Wang Wei(17)
- Restud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Remains at Yabazhuang in Renqiu, Hebei
..... *by* Peng Juru and Gao Tianlin(32)
- Wucheng Site and Shang Period South China *by* Shi Jingsong(46)
- A Study of the Divination and Inscription-writing and -engraving Institutions in
the Yin Period *by* Feng Shi(66)
- Cultural Relations of the Zone along the Great Wall in Inner Mongolia with Adjacent
Area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y* Wuenyuesitu(103)
- A Brief Account of the Jades Unearthed from Sites of the Spring-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by* Cao Nan(125)
- Commentary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 Mausoleum
..... *by* Liu Qingzhu(133)
- Remains of the Qin-Han Period Great Wall Known in Archaeology
..... *by* Xu Pingfang(162)
- A Summary of the Murals Discovered in Ancient Chinese Tombs
..... *by* Yang Hong(172)
- Ancient Chinese Scissors *by* Yang Yi(192)
-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Industry of Bronze Mirrors in Linzi during the Han
Period *by* Bai Yunxiang(207)
- On the Wooden Pillows Unearthed from Western Han Tombs *by* Hong Shi(244)
- On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Han Period Tombs *by* Tan Changsheng(258)
- Jades of the Eastern Han and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s; Links between Earlier and Later Times *by* Lu Zhaoyin(279)
-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illa and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Its Capital
City *by* Wang Zhongshu(291)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ngren I Culture and the Naifeld Type; Also on
the Function and Name of the Slanting-mouthed Pottery Object
..... *by* Lin Xiuzhen(302)
- On the Lu Ye and Lu Sheng Epitaphs of the Ming Period *by* Xu Yuanbang(320)

Chronicle of Events at Archaeology Publications (Editorial Secti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331)
Postscript	(338)

时 光 常 存

(代前言)

白云翔 施劲松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面对书架上的考古学期刊，心中总禁不住生出如是感慨。这些期刊每一本是那样薄，但排放在一起时，竟然意味着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每一本又是那样厚，因为它们记录了太多的内容，还因为它们凝聚着一代代考古人和办刊人的心血。每当新的期刊带着书香摆放上架时，那些字句曾经历历在目的刊期已在不知不觉间变得遥远。历史也正以这种方式一点点向前和向后延伸着。

这是一段丰富而难忘的历史。它记录了中国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展现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的学术业绩，记述了中国考古学学术期刊的发展历程，更留下了几代办刊人的足迹。

—

对于这段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就学术史而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在那时，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知识广为传播，新学科不断出现，许多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开始的。1921 年河南渑池县仰韶遗址、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1927 年北京周口店遗址和 1928 年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等，催生了中国近代考古学。考古资料的出土，开创了一条研究历史的新途径和一个获取人类历史知识的新领域。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学术期刊也由此产生。1936 年 8 月，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继安阳发掘报告之后，创办了《田野考古报告》。创刊时，它被列为专刊之十三，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该时李济任总编辑，编辑有傅斯年、董作宾、徐中舒和梁思永。

在《田野考古报告》的创刊号上，李济专门写下了《编辑大旨》。他指出，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已经超过了尝试的阶段而成为一种新的学问；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而创办刊物，则是“要稳定考古学的基础，我们必须将历年来各处田野工作辛勤积来的田野知识系统的记录下来。一方面作每一个工作的结束，一方面为后来学者作一个参考。将这些不同的记录汇集起来，再由史学家自由的比较采取，也是印行这个刊物的重要的旨趣”。此外，这篇不长的《编辑大旨》还强调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联系，以及不同区域间考古材料的比较。

《田野考古报告》第 1 册发表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调查和发掘报告，包括梁

思永在赤峰等地采集的史前石器和陶片、刘燿对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的介绍、董作宾对安阳侯家庄出土甲骨文的报道、郭宝钧对浚县辛村古墓的清理、李景聃对寿县楚墓的调查，以及吴金鼎对高井台子三种陶业的概论等。遗憾的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刚刚起步的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及《田野考古报告》的出版都随即中断。直至1947年3月，《田野考古报告》第2册才得以出版，并更名为《中国考古学报》。在《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和1948年出版的第3册中，继续刊出了一批考古学的田野资料和研究成果，其中有高去寻对黄河下游屈肢葬的探讨、刘燿对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分析、夏鼐对齐家期墓葬年代的改订、李济对小屯青铜器的研究、王湘对寿县史前遗址的调查、石璋如对小屯地层等的介绍、杨钟健对殷墟扭角羚的讨论、祁延需对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的调查、李景聃在商邱永城和造律台的发掘等。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考古学报》共出版3册。《中国考古学报》的创办以及当时提出的一些办刊思想，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所刊发的那些文章，是中国考古学最早结出的硕果。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考古学在初创时期的学术重心与学术关注点。

二

新中国刚刚诞生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即告成立。随后中国科学院接收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酝酿以此为基础建立考古研究所。在此期间，1949年12月，作为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编辑出版了《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中国考古学学术专著系列——中国考古学专刊开始出版。以后这一系列按著作性质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和特刊连续不定期出版。

1951年12月《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出版，同时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郑振铎，常务委员梁思永，委员夏鼐、郭宝钧、黄文弼、苏秉琦。1953年12月第6册出版时，更名为《考古学报》，同时成立《考古学报》十五人的编辑委员会，主任郑振铎，委员有尹达、王振铎、向达、范文澜、梁思永、夏鼐、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张政烺、陈梦家、裴文中、翦伯赞、苏秉琦。该期还刊出了《考古学报》的第一份《征稿简约》，其内容包括对论著类别、文体、篇幅、图与照片、审稿和“度量衡”单位等方面的要求。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考古学报》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惟一一种大型学术刊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使考古新发现不断出现，1954年5月文化部还在北京主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介绍这些新发现的报道文章需要有可以迅速发表的园地。而自1952年我国开始培养考古工作的专门人材以来，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们结业或毕业后在业务上也需要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建议在《考古学报》之外再办一个刊物，可取名为《考古通讯》。这一建议几经酝酿，大多数意见认为已有的《考古学报》多刊登长篇考古报告和专门性研

究成果,另一个由文化部文物局于1950年初创办的《文物参考资料》则主要刊登和宣传有关文物的重要政策法规,以及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工作报道和经验介绍,对考古发现的报道则只占刊物篇幅的一部分,因而都赞成创办《考古通讯》这种专业性的刊物(夏鼐:《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周年纪念》,《考古》1984年第5期)。1955年1月10日,由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通讯》正式创刊,夏鼐任主编、陈梦家任副主编。同时成立十八人的编辑委员会,郑振铎任召集人,委员有尹达、王振铎、王冶秋、向达、李文信、夏鼐、郭宝钧、黄文弼、张政烺、陈梦家、张珩、曾昭燏、冯汉骥、贾兰坡、裴文中、翦伯赞和苏秉琦。

《考古通讯》首期刊发的创刊词指出,建国以来的考古事业空前活跃,工作繁重,收获巨大,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这就需要有一个定期的刊物,可以互通声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以便取得问题的解决。有了这样一个刊物,还可以多多地介绍一般的考古学的知识,介绍苏联的经验,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高我们的工作效力,并培养更多的考古工作者出来”。同时提出,“希望由于这个刊物的印行,可逐步地从普及知识而做到提高田野工作方法和室内整理方法。希望这个刊物不是刊载长篇巨著的研究,而是尽可能的多登一些考古工作者实际需用的知识,多登一些各地有关发掘、清理和调查的简讯。这个刊物的问世,对于推进中国考古事业有着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是要求全国考古工作者一同负担的”。同期也刊出了与《考古学报》《征稿简约》内容相似的《稿约》。

《考古通讯》的创刊词说明了创办刊物的背景与缘由,也明确了刊物的要求与目的。在以后的发展中,除“考古工作者实际需用的知识”逐渐减少外,该刊始终以刊登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简报与简讯为主。创刊时提出的使命至今未变,通过刊物来交流信息与经验、提高田野工作和室内整理方法的希望等,也依然是今天刊物的目标。

随着《考古通讯》的创办,考古研究所还于1955年正式组建了从事考古期刊编辑的专门机构——考古编辑室。从此,编辑室承担了考古研究所学术出版物的编辑任务。

在《考古学报》重新出版和《考古通讯》创刊后,两刊的刊名、刊期等多次有所调整。《考古学报》在1951年~1955年间大致每年出版1期,1956年~1959年每年出版4期,1960年~1965年每年出版2期。1951年第5期的文章后还附有英文提要,以后几年的刊期也大多如此,在有一段时间甚至还附有俄文提要。《考古通讯》创刊时为双月刊,1958年改为月刊,1959年更名为《考古》,并由32开本改为16开本。从1959年开始,《考古》也增设了英文或俄文目录。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非常丰富,考古事业发展迅速。《考古》和《考古学报》遵照各自的宗旨,为推动考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两刊从一开始也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与特点。

这一时期《考古》刊发的内容,除考古简报与简讯、综合性报告和研究论文外,还有各地考古工作概况、考古新发现、考古知识与技术、书评、书目、以苏联为主的东欧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考古经验或介绍,以及各种政治背景下的评论文章。特别是在50年代,《考古》在报道新发现、交流信息、介绍考古知识和技术,以及开展学术讨论等方

面，发挥的作用较为突出。而《考古学报》刊发的内容则始终只有调查发掘资料与研究论文两部分，基本未受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重要发掘成果当时都是由《考古学报》较为完整和系统地刊布的，如殷墟大司空和小屯遗址、郑州二里冈遗址和郑州商城、长安普渡村西周墓、淮安青莲岗遗址、洛阳汉魏城和隋唐城、闽侯昙石山遗址、晋宁石寨山墓葬、寿县蔡侯墓、长沙楚墓、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赤峰红山遗址、四川船棺葬、屯溪西周墓、万年仙人洞、燕下都等等。许多综合性或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由《考古学报》发表，其内容多涉及史前文化、商文化、甲骨文、商代和西周青铜器、战国两汉铁器、汉代简牍、古代丝织品、古代丧葬制度、中西文化交流，以及陶瓷工艺研究、金相学研究、人骨研究和动物化石研究等。

两刊的内容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和特点。在50年代，比较深入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传统领域，如殷墟考古、甲骨文和青铜器等，知识性的介绍和讨论所占比重较大。但从5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等重要理论和方法问题开始提出，史前文化的分区与分期，古代社会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性质、墓葬制度等成为研究重点，研究领域也扩大到了古代工艺、金属成分测定、人骨研究和中西交流等。1959年，《考古》还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的考古学体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考古研究所的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考古》、《考古学报》和考古学专刊的编辑出版随之停止。直到1971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故宫参观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之后，请示周恩来总理将《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三种刊物复刊，以发表新的资料。经周总理亲自批准，《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终于得以复刊。“当时全国公开发行的期刊只有《红旗》一种，可见这三种刊物是得到非常的重视”（夏鼐：《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周年纪念》，《考古》1984年第5期）。为筹备复刊工作，考古研究所从1971年下半年开始从河南干校和其他发掘工地抽调了部分同志回京，同时由夏鼐、王仲殊、安志敏组成编辑领导小组。1972年初，《考古》和《考古学报》正式重新出版，其发行量在随后几年曾一度达到每期十余万册。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许多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但考古发掘却没有完全停滞。从1966年到1971年，全国仍有许多新的考古资料出土，并且不乏重大发现。历数其中重要者，有史前时期的山东邹县大汶口墓葬，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河南浙川新石器时代遗址；商时期的山东苏埠屯商代墓葬，陕西绥德和湖南宁乡青铜器；西周时期的洛阳西周墓，陕西岐山、湖北京山、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铜器；东周时期的山西侯马墓地与盟书，长沙楚墓；汉代的河北满城汉墓，江苏徐州汉墓，广西合浦汉墓，武威雷台汉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京东晋墓，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唐宋时期的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洛阳含嘉仓，洛阳关林唐墓，西安唐墓，辽宁北票和内蒙古翁牛特旗辽墓，河北正定等地的宋辽塔基；元明时期的北京元大都，四川凤凰山明墓和北京西郊明墓等（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1971年以后的几年间，各时代的重要发现仍不间断，比如陕西姜寨遗址的发掘，二里头宫殿的揭露，小屯南地甲骨的出土，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以及西

安唐代青龙寺遗址的清理等。

这些新材料急需报道,《考古》和《考古学报》的复刊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从1972年初开始,这些资料及相关研究构成了两刊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复刊还使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得以发表。如在复刊后的首期,《考古学报》发表了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则发表了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不过,《考古学报》1972年仅出版1期,1973年~1977年每年出版2期,1978年后才恢复为季刊。而《考古》于1972年~1982年间为双月刊,1983年方才恢复为月刊。从5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考古学报》和《考古》由编辑室编辑,由科学出版社或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尤其是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考古事业和整个科学事业一样又迎来了春天。以往的田野资料亟待发表,新的考古发现接连不断,广大考古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推出科研成果。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有的“三大杂志”已远不能适应考古学日益繁荣的需要。为此,1981年考古研究所又创办了《考古学集刊》这一大型不定期连续出版物,陆续发表重要的考古资料和研究论文。

八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对办刊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夏鼐先生在纪念《考古》创刊200期时,提出刊物要继承《考古》创刊以来的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保证质量的编辑方针;要研究论文和田野资料并重,因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使我们有条件多做和做好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工作,希望通过这两类文章,提高我国考古学的水平。作为编辑工作者则应“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夏鼐:《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考古》1984年第5期)。这一时期两刊刊载的内容也表明,考古学界开始总结过去30年的考古学,对史前文化的研究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诸如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一类的热点问题开始形成,区系类型理论等也被提出和讨论。尤其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文明起源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聚落考古进一步受到重视,由考古学来重建历史和建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等问题被广泛关注。

回顾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刊物的发展历程,《考古学报》、《考古》及《考古学集刊》虽各有其办刊宗旨,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风格,但它们始终坚持报道考古材料和刊发学术研究成果,忠实地为考古事业服务。即使是在五六十年代,各类时事评论和语录等占据了一定比例,但考古资料的报道并未受大的影响,学术性的考古学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张光直就曾说过:“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经纬分明,相互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这里虽不独指《考古》与《考古学报》,但两刊的情况确如所言。在今天看来,忠于学术又可被视为30多年中两刊所保持的基本传统之一。正是在此传统下,两刊坚持报道的田野资料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基础,在两刊上提出和讨论的诸多学术问题至今仍是考古学的传统课题,许多当时的重要理论和思想,在今天得到了广泛运用和发展。

除期刊的编辑出版外,中国考古学专刊的编辑出版同样成果丰硕。至1997年,甲种

研究性著作出版 25 部，乙种资料性著作出版 31 部，丙种通论性著作出版 4 部，丁种田野考古报告出版 52 部。它们是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就，也是学科赖以发展的基石。

三

时光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这时中国考古学进一步迅速发展，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研究领域、理论、方法和手段日益扩展，对考古材料的认识不断深化。文物考古类期刊的编辑出版也因此而出现空前的繁荣，相关学术期刊全国已发展为 20 多种。同时，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为更好地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和适应考古事业的新形势，考古研究所在以王立邦为书记的所党委领导下，于 1997 年 8 月以考古编辑室为基础正式组建了考古杂志社（内设机构名称为“考古研究所考古编辑室”）。杂志社的成立，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版一流的学术刊物；同时，加强同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以多种刊物的整体优势更好地服务学术、繁荣学术和引导学术。

考古杂志社由白云翔任社长，下设《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专刊三个编辑部和综合部，2001 年增设《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编辑部。主要负责《考古》和《考古学报》的编辑、出版、发行（自 1998 年第 1 期起），以及《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和中国考古学专刊的编辑。

考古杂志社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服务学术、繁荣学术、引导学术”的办社方针，为办好学术刊物、构建学术平台、推进学术发展进行了不懈努力。十年来办刊的总体思路是：编辑出版是中心，制度建设是保障，队伍建设是关键，学术活动是重要补充。

（一）编辑出版

考古研究所在新时期办刊的指导思想是，使刊物成为考古学界的学术园地和考古学的窗口，公布新资料、刊发新成果、交流新信息、探讨新理论与新方法，同时承担加强学术交流，联系中外学术界、促进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结合，以及培养人才等多方面的重任。

继承与创新是考古杂志社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工作方针。在刊物布局上，一方面原有的两个刊物保持了过去的传统与风格：《考古学报》作为考古学界惟一的大型学术期刊，仍主要刊载考古发掘的中型报告、考古学与古代史论文，以及科技考古报告和论文；《考古》主要刊登田野考古的简报与简讯、考古学研究论文、科技考古的实验报告与专题研究，以及重要的书评和学术动态等。另一方面，为适应全国文物考古类学术期刊出版的新形势和考古研究所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研究所的需要，《考古学集刊》自 2006 年第 16 集开始，调整为“以发表本所及相关研究人员撰写的考古学各领域的优秀论文为

主，少量发表优秀中篇发掘报告”。同时，为了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考古研究所又于2001年创办了《中国考古学》(英文版)(*Chinese Archaeology*)。《中国考古学》(英文版)每年1卷，主要内容是上一年度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根据以上方针、布局和刊物的自身特点，各刊都对围绕如何提高学术水平与编校质量从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与探索。

首先是坚持正确的办刊思路。办刊需要有明确的思路来决定刊发内容，并据此进行选题策划，对稿件加以组织安排。而刊发文章的类别与组织安排等，又体现了刊物的特点与办刊思想。对此，《考古》根据周期短、稿件类型多和组织灵活等特点，以实行栏目制为重点进行了相关探索。

《考古》栏目制始于1996年，当时以“调查与发掘”和“研究与探索”为常设栏目，刊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以“新发现·新进展”、“本刊专稿”和“述评·综论”为重点栏目，组织编发考古重大发现和前沿课题的稿件；设立“考古与科技”以适应学科发展的新形势；利用“学术动态”与“书刊评介”评述重要的学术成果并扩大刊物的影响。栏目制编排使《考古》严谨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相统一，增强了编辑的计划性，突出了刊物的特点。此后，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刊物的定位，《考古》的栏目不断得以调整和完善。1998年设立了“信息与交流”，及时介绍考古学的新著和各地的学术活动，并由此消除了转页和空白页。2000年将“书刊评介”调整为“读书与思考”，刊发论文从更新的视角、更深的层次、更宽的视野去审视新著的学术价值，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讨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园地。随着对外交流的加深，更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考古学，其研究同样是中国考古学的成果，而且这些研究的理论、方法、视角和学术兴趣还能给予我们很多借鉴和启示。2001年设立“海外学者论坛”，就是为了向国内学术界推出国外学者的研究，促进学术的交流与发展。考古学的进步离不开新材料，考古研究中所有问题的产生、解答和新问题的提出，也无不以考古新发现为契机。为了及时报道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重大影响的考古新发现，2003年又设立了“考古前沿”。至今，《考古》共设立了15个栏目。此外，为使刊物在形式上更为规范，也为进一步方便读者阅读，《考古》于2000年增设了英文提要、中文和英文关键词，于2002年增设了“本期要览”等。

《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从2002年出版的第2卷开始也实行了栏目制，以“调查与发掘”和“专题研究”为主，另有“特色报道”、“新发现”、“科技考古”、“论坛”和“信息”等。这些栏目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使海外学术界得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的近况。《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虽因刊物特点而不设栏目，但在稿件的组织与安排上则突出材料和研究并重，并更为强调资料的系统性与研究的综合性。

其次是加强选题策划，即“从大处着眼”。有了明确的思路，就需要据此策划选题并进行组稿。在此方面，《考古》发挥了灵活的特点和栏目制的作用，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组织专稿。一是利用“考古前沿”和“新发现·新进展”组发重要的考古新资料。从2002年起，还于每年组织刊发一组“中国考古新发现专稿”。二是组发区域性专稿。在新世纪的第一年，《考古》制定并启动了编发全国各省区专稿的5年计划。制定这一计划的主要想

法是,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取得进展和成就的基础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同样有赖于此。因此, 组发全国各省区专稿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考古》从 2000 年开始, 每年通过“本刊专稿”栏目编发 6 个省区的综述性论文和重要的发掘简报。至 2006 年, 共编发了 27 个省、区、市的专稿, 对促进区域考古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 又针对考古材料出土较为丰富的城市或地区, 进一步对长沙、济南、吐鲁番等地的重要发现进行了集中报道。今后, 《考古》将继续编发此类区域性专稿。三是围绕一些重要课题或专题组织专稿,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为纪念殷墟考古 70 周年而组发的“殷墟考古”专稿, 为促进中外合作考古和及时报道相关成果而组发的两组“中外合作考古”专稿, 为展示三峡地区考古工作成就而组发的“三峡考古”专稿, 为深化偃师商城研究、促进商代早期都城宫室制度和年代学研究等而先后刊发的三组“偃师商城考古”专稿, 为纪念二里头遗址发掘 45 周年而组发的“二里头遗址考古”专稿, 为纪念汉长安城考古 50 周年而刊发的“汉长安城考古”专稿等。这类专稿对促进相关课题的研究等具有良好效果, 围绕学术专题或重要课题进行选题也仍将是《考古》今后的方向。四是为配合一些重大事件组发专稿。比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组发了纪念中国考古学 50 年的专稿, 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刊发了成组的纪念文章, 为庆祝香港回归及纪念回归 2 周年和 10 周年而分别组发了 3 组“香港考古”专稿。这类专稿兼具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组织编发上述各类专稿, 往往是时限短、难度大、要求高、责任重, 远非编发普通稿件所能相比。编辑部的同志需要进行先期调研, 反复商议, 沟通协调。稿件到位后进行编辑时, 还需要抢时间、保质量。为了这些重要稿件的如期刊出, 编辑们尽了最大努力。

《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也进一步加强组织稿件的工作, 刊发了大批考古重要成果。《考古学报》为纪念创刊 70 周年, 于 2006 年第 3 期组织编发了纪念专号。《考古学集刊》第 16 集通过向所内研究人员约稿的方式, 就进一步突出刊物特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中国考古学》(英文版) 通过全面梳理前一年度各刊物发表的文章, 确定选题, 然后根据刊物的要求重新组稿。

各刊物的上述选题, 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10 年来考古学的某些特点, 那就是区域考古更为深入, 传统课题和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热点问题得以继续, 有关文明起源、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等的分量加重, 更多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被运用到田野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中, 研究的思路和视野更为开阔。

第三是努力规范编辑工作, 即“从小处入手”。稿件进入编辑程序后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如何编辑加工。为此, 就需要制定和完善刊物的编辑体例。体例并不仅仅是编辑工作中的技术性要求, 它最终体现的是学术的规范。而刊物的学术规范, 反过来又将影响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科学、规范的体例亦成为衡量一种学术刊物的重要指标。

考古刊物所具有的特殊性, 使得学术规范更为必要。特殊性之一, 在于刊发内容以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为主。如何对考古资料进行科学、完整和系统的整理和报道, 这直接影响到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科的发展。对此, 发掘者需考虑如何科学、完整地获取和整理资料, 刊物则需考虑如何科学、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报道。而后者还可对田野发掘和

资料整理提出新的要求，正如《考古通讯》创刊词所言：能促成田野工作和室内整理方法的提高。特殊性之二，是考古类文章的内容决定了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比如既有发掘简报和报告，也有研究论文和实验报告，涉及的学科除考古学及相关人文学科外，还有自然科学。各类文章又都有大量插图、图版、表格、数据、符号，还有很多对古代典籍的引文、外文、生僻字，金文和甲骨文等。在科技考古类的文章中还有自然科学的术语、算式和符号。特殊性之三，在于许多资料类稿件的用稿标准更多地取决于资料的学术价值而非文章的写作水平，对一些资料类稿件因此而需要作很多修改。这些特殊性极大地增加了稿件编辑的难度。而编辑体例不仅使我们在编辑稿件时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学术的规范。

基于以上认识，各期刊和专刊都制定了各自的编辑体例，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修订。以《考古》为例，现有的编辑体例就有6章100余条。实践证明，依照科学、合理并切合实际的体例进行编辑，可有效地保证刊物的学术性与科学性，对学科建设也产生了良好作用。在按体例加工稿件的过程中，编者对学术规范的作用与意义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能在技术层面上熟练编辑，而且还将许多规范和体例的内容上升到学术层面上来认识和把握。但体例并不表明工作可以简单化。相反，它对任何一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制图与图版、文字加工、版式设计、校对，每个环节都需一丝不苟。由于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能千差万别，因此详尽的体例也并不意味着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尤其是考古类文章所具有的那些特殊性，使得编辑时需要核查每一句描述、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表、每一条注释，遇到问题时需反复向作者核对，甚至与作者一同改稿。当那些资料最终准确无误地出版时，字里行间已再看不到编辑们曾经一遍遍加工和查对过的字句。编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为学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也在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期刊和专刊编辑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由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绘图组对每一幅图加以审核或修改。对插图的两次审改，确保了插图的质量。杂志社聘请的翻译人员，为两刊翻译英文目录、关键词和提要。杂志社综合部还负责对排版、印刷、装订、出版、发行等各环节进行管理或监督。

实践还证明，作为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学术刊物，办刊离不开研究所和学者们的指导，离不开集思广益。其中，最直接的指导来自《考古》和《考古学报》两刊编辑委员会。2001年1月，《考古》、《考古学报》成立新一届编辑委员会，刘庆柱为主任、王巍和白云翔为副主任，委员有王仲殊、仇士华、朱凤瀚、任式楠、安志敏、李伯谦、李学勤、张长寿、陈星灿、袁靖、徐苹芳、高崇文、伦福儒（英国）、樋口隆康（日本）。2002年2月，两刊编辑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了各刊的工作汇报和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意见。编委会提出，几种刊物应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做好各刊间的规划和分工；《考古》和《考古学报》应坚持原有的办刊方针，既要重视新发现和新资料，也要重视新热点和新视角。编委会还对《考古学集刊》从16集开始的调整，以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的创办和第一卷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1年1月正值世纪之交，恰逢《考古》创刊400期。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应《考古》之邀对中国考古学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考古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1

年第1期)。学者们从多方面提出并阐述了诸多考古学的重要问题:比如关于中国考古学,讨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前文化源流、古代文明、北方草原地区的考古学、古代玉器,以及中国考古学今后的重要课题等;对于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考古发掘材料与传统的历史文献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科技考古、生态学与地貌学与考古调查的结合等问题;对于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阐发了中国考古学对于理解世界史前史和世界文明所具有的意义、中国考古学与欧亚考古学的关系、中外考古比较研究和中外考古学的交流等。这些关乎中国考古学重要课题和未来发展的阐述,无疑也指示出了今后刊物发展的方向。2005年《考古》创刊50周年之际,学者们直接就办刊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殷切的希望(《新世纪的学术期刊与考古学的繁荣发展》,《考古》2005年第12期)。学者们指出“(《考古》)一直坚持了创刊宣言所坚持的‘推进中国考古事业’的大方向,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期待着刊物能“办得更有特色,更有前瞻性”,“在新世纪中继续发挥学科中心和前沿作用”。同时希望刊物“能够继续把握考古学发展的脉络,洞察学术研究的前沿,在发表重要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可有计划地发表一些具有引导性的文章,这样,既可引导学术界对某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又活跃了学术气氛。”还希望“对考古学理论、方法及学科体系等继续进行研究和探索。”“站在国际考古学研究的高度,适当增加国际考古研究的新动态、最新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运用成果、以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等方面的报道刊发。”2006年,《考古》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期刊奖一等奖后,考古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获奖座谈会(《〈考古〉荣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一等奖座谈会纪要》,《考古》2006年第12期)。与会学者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刊物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在新形势下办好学术刊物,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刊物的编校质量等,再次提出了诸多建议和意见。认真、努力吸收这些建议和意见,将有助于刊物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

此外,杂志社还经常就一些具体设想征求有关部门或专家的意见。比如,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更多地运用于考古发掘与研究中,拓展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产生了许多新成果。就《考古》的“考古与科技”栏目而言,既需要更好地介绍新的理论、方法与成果,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栏目的学术含量。为此,2003年6月杂志社与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的专家和负责人围绕如何办好“考古与科技”栏目共同商讨,明确了该栏目应主要刊发学术意义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论文、应用于考古学中的自然科学的新方法,以及重要的资料和测试数据。同时,还一同就完善科技考古类文章的编写体例,以及如何与国际同类刊接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一些组稿选题,杂志社和编辑部也经常征询所内相关研究室的意见。

刊物服务于学术,是通过服务于广大的作者和读者来实现的。因此,刊物还需要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2005年夏,杂志社向考古所科研人员发送了《考古》和《考古学报》读者意见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两刊的学术水平、编校质量、学术公正性、学术包容性,以及装帧、印刷等约20项指标。据调查结果,两刊所有项目的“优良”得票率均在50%以上。《考古》“栏目设置”、“编辑规范度”,《考古学报》的“学术水平”、“资料